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

顾祖钊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文化与诗学系列



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

顾祖钊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顾祖钊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9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301-09372-1

I. 华… II. 顾…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818 号

书 名: 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

著作责任者: 顾祖钊 著

责任编辑: 施 然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372-1/I·07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3 印张 365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作者简介

顾祖钊，1941年11月7日生，安徽省太和县人，1966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学科负责人，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研究所所长，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协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艺术至境论》、《文学原理新释》、《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诗魂的追寻》等。

内容简介

本书对华夏原始文化进行了梳理，对不同的文化文本进行了互文性研究，并提出中国古代文化观念的基本形态为象征文艺观、抒情文学观和历史文学观——中国古代“三元文学观”——这一新见解，同时对这三种文学观的产生、流变、特征、影响、作用方式以及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本书资料翔实，论证方式新颖独特，是一本新意迭出、引人深思的著作。



“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系列目录

《在文本与历史之间——中国古代诗学意义生成模式探微》

李春青

《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

郭英德

《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

顾祖钊

《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

高小康

“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生成”系列书目

《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理论问题》

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

程正民 程凯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价值观的演变》

童庆炳等

《中国喜剧观念的现代生成》

张健

《中国现代文学的心理学研究》

刘勇

《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

陶东风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

陈太胜

《意识形态视域中现代化与转型》

季广茂

“文化与诗学”系列书目

《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

赵勇

《王蒙小说文体研究》

郭宝亮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理论批评的现代阐释》

程正民 王志耕 邱运华

责任编辑 / 施然

封面设计 / 奇文云海

qwylh_crf@yahoo.com.cn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顾问：启功

主编：童庆炳

委员：钱中文 王先霏 程正民 朱立元

童庆炳 郭英德 金元浦 罗 钢

周 宪 陶东风 黄卓越 王一川

李春青（常务） 周小仪 曹卫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编委会

顾问：启 功

主编：童庆炳

委员：钱中文 王先霈 程正民 朱立元
童庆炳 郭英德 金元浦 罗 钢
周 宪 陶东风 黄卓越 王一川
李春青(常务) 周小仪 曹卫东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童庆炳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宪法性”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化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人们已经对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本自身，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的紧迫问题。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文本自足”的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

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的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庸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主要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惟”这些东西为主臬，为上帝，为神明，那么物欲、金钱欲、情欲、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语境，乃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完全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目前

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过分“社会学”化的话语,也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面临学科体系受到冲击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如果不一味滑向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不一味坚持其二元对立的僵硬的方法,那么由于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使文学理论原有格局发生变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文革”前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经历过“文革”的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还有其他一些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继承下来,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在审美、主体、语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发展的广阔的空间。

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么能把“诗意”“反”掉呢?我们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不值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我们不必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外国的文化研究与我们的文化研究究竟有什么异同?一般认为,国外的文化研究是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特色是一种政治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晚期,早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已经被文化的渗透所代替,是让人异化,舒舒服服地变成奴隶,成了奴隶还感觉不到。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它关键的词语是种族问题和东方主义、性别问题和女性主义、地域问题和社群主义、阶级问题和社会主义、古今问题和新历史主义等。其研究是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出发,而选取了这样一些话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批批的文艺学流派。我们的文化研究则要走自己的路,或者说要按照中国自身的文化实际来确定我们自身的文化诗学的思路。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文化诗学研究就其基本原则说可以有五点:

第一是历史优先原则。文化语境的研究,不论我们是研究现代的文学问题还是古代的文学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放置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尽管绝对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难以追寻,但是无论如何难,我们还是要自觉地去。过去我们的研究也常这样做,但我们常常不够自觉。更多的时候,就理论问题谈理论问题,注意的是观点和形式逻辑,所以别的专业的人士常说我们搞理论的人所写的文章比较空。文化诗学应该自觉改变这种状况,使我们讨论的问题进入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所讨论问题的针对性自然会凸现出来,自然会摆脱那种脱离现实的状况。

第二是对话原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还是研究前人的文学理论,都是对于作家、作品或原有理论家、理论作品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不是独语,而是一种对话。我一直主张古今要对话,古和今是两个主体,要进行对话,要把古代的东西激活,然后进行对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其次是中西的问题。与古今问题一样,哪些可以全球化,哪些不可以全球化。实际上这也是文化研究中很热的一个问题,这里面问题很多。我认为,中西问题是

一个对话和共享的问题。另外,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或理论家的一种对话。对话要真正的平等才能深入地展开。就像我们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一定要平等相待,十分地恳切和真诚,彼此才能敞开心扉,通过交谈,做到双方都受到教益。我们在对作家(作品)、理论家(理论著作)的研究中也应该是如此。把对象也当成一个值得尊崇的主体,想尽一切办法激活它,让它似乎也真的成为一个鲜活的主体,能够袒露自己的真意;而作为研究者也自然是一个主体,能以商榷的态度,而不是以强加于人的态度,与对象实现真实的对话。只有在这种对话中,研究才是比较客观的和可靠的,而不是主观的、随意的。

第三是自治原则。文化诗学的研究,应该是圆融的,能够自圆其说的。例如其中的阐释、比较,不能自相矛盾或前后矛盾,应该在观点和方法上一以贯之,逻辑上能自治而圆通。你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和新的比较,但必须合情合理。所有片面的论述,其中弱点之一,就是不能逻辑自治。

第四是联系现实问题原则。学术研究完全可以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的独立性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初的杰出学者王国维就说得很清楚。但文化诗学的思路则如上面所述,应该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研究,提炼出某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来。这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正好是现实所缺失的东西,因此我们通过文化诗学所获得的成果可以弥补现实的不足,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馈。当然,我们的研究可能不是对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正面研究,不可能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研究那样正面解决社会问题。但从诗学的视野出发的研究,可以以间接方式回应社会,不也很好吗!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累积的问题很多。文化诗学应该有问题意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的文化研究应该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对诗意的追求。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摒弃诗意视角。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大可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

序

李春青

顾祖钊先生无论是资望,还是学术水平都远在我之上,他请我为他的新著作作序,本来是愧不敢当的,但近年来,请后学作序似乎成为一种时髦,考虑到这一层,惶恐愧怍之感也就释然了。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生成、演变及其基本形态是学术界始终关注却最难有突破性成果的大课题。看几十年来的研究,从历史唯物论、神话原型批评、生殖崇拜理论、文化人类学等视角进行的探讨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在这个领域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我以为,顾先生的这部著作在方法上可称为“文化诗学”的,由于采用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也就有了新的发现。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在具体文化语境中对某些似乎人人皆知的提法予以新的阐释。例如“诗言志”是人人可以诵之于口的诗学命题,其含义看上去似乎早已确定无疑了。然而从文化诗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观念或命题都只有在具体的言说语境中才能确定其本来的含义,因此任何诗学阐释都应该先确定阐释对象产生的具体文化语境。那么“诗言志”的言说语境是怎样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个诗学命题的具体含义也是不确定的。我们如果像顾颉刚等史学家主张的那样,确定负载这个命题的文本《尧典》是战国时期才提出的,那么由于春秋“赋诗”活动的普遍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诗言志”的含义与《左传》中的“诗以言志”即通过赋诗来表达某种与诗歌文本并无多少关系的意愿有什么不同;如果按照另外一种主张(例如徐复观)认为《尧典》应成于西周之初,那么“诗言志”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这个“志”字或许就应该理解为闻一多先生所主张的“记忆、记录和怀抱”之意了。后人不少,都不约而同地采信《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

而形于言”这样望文生义的解释。顾先生独辟蹊径,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确定《尧典》就是唐尧时的产物,进而联系彼时巫术盛行的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之志”,而是“天之志”,从而对这个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崭新的解释,无论这种解释是否完全合乎实际的情况,这种新解释本身就具有真正的学术意义。诸如此类的阐释在这部著作中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了。

其二,对不同的文化文本进行互文性研究是文化诗学的一个重要视角,因为在同一文化语境中不同文化文本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互文性关系,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由于学科分类意识不像西方那么明显,这种情形就更加突出。顾先生认为《易经》的卦辞、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也是很有见地的观点。在中国古代,《易经》与《诗经》虽然同为“五经”之属,但前人很少有人能够看到二者之间的一致性;现代学者虽然也有人专门探讨过《易经》的文学性特征,但也未能指出其与《诗经》之间的深刻关联。顾先生的见解虽然并非没有可以继续推敲之处,但这种思路本身就有很大的学术意义。

其三,提出“象征”、“抒情”、“历史”等中国古代“三元文学观”这一新见解。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基本形态,以往论者多从价值观念角度分为儒家、道家、佛释三大系统;也有人从功能的角度分为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类型。顾先生则从言说方式的角度提出“象征文学观”、“抒情文学观”、“历史文学观”的“三元”之说,我认为是言之成理的,较之前人诸论更符合实际情况。特别是“象征文学观”的提法,作为对汉代以前、以儒家为主的文学观念的概括应该说是很准确的。尤为难得的是,顾先生对于这种“象征文学观”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文化逻辑进行了深入探讨,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学观的形成原因。这较之以往那种简单地将儒家诗学定义为政治伦理教化文学观并予以轻视的做法是高明多了。另外“历史文学观”的提法作为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概括也是独具慧眼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无论是其发生,还是价值观念与叙事方式都与古代源远流长的历史观与历史叙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顾先生是一位很勤奋的学者,近年来在文学基本理论与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创获良多。此次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生成、演变与基本形态的考察是

其对学界的又一新的贡献,这毫无疑问是值得称道的。当然,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与研究任务的艰巨性,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也难免存在着一些不够稳妥的提法与结论,特别是有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史料的鉴别与使用上显得有些不够慎审。但无论如何,这部著作是当得起“瑕不掩瑜”这四个字的。

2004年11月12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童庆炳(1)
序	李春青(1)
第一章 华夏艺术的原始浑一阶段	(1)
一 原始艺术呈现的华夏民族的文化时空	(1)
二 浑朴天真、璀璨夺目的华夏原始艺术	(9)
三 对华夏原始艺术的几点思考	(24)
第二章 华夏巫术文化和第一个文学观“诗言志”的产生	(49)
一 华夏巫术文化兴起与不平等社会的产生	(50)
二 华夏巫术文化特征与第一个文学观念的发生	(66)
三 《周易》经、传的诗学品格	(82)
第三章 先秦儒家象征文艺观	(109)
一 孔子及先秦儒家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110)
二 先秦儒家象征的哲理的文艺观	(121)
三 先秦儒家象征文艺观形成的具体原因	(143)
第四章 先秦象征的哲理的文艺观对后代的影响	(161)
一 汉魏六朝时期的象征与哲理文艺观	(161)
二 唐宋时期象征的和哲理的文学思潮	(181)
三 元明清时期主理派文学观的起伏	(215)
第五章 华夏抒情文学观念的发生及流变	(236)
一 华夏抒情文学观念的酝酿阶段	(236)
二 华夏抒情文学观念的确立阶段	(252)
三 华夏抒情文学观念的发展时期	(271)

第六章 华夏历史文学观念的发生及发展	(296)
一 华夏历史文学观念的诗史混同论阶段	(297)
二 华夏历史文学观念“以诗为史”的阶段	(307)
三 华夏历史文学观念的激烈争鸣与发展	(316)
余 论	(344)
后 记	(353)